

名将彭雪枫的“三件宝”

彭雪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9月，彭雪枫在抗日前线作战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彭雪枫在新四军任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区司令员、担负一个独立战略区的领导工作期间，创办和建立了骑兵团、《拂晓报》和拂晓剧团，被人们称为彭雪枫师长的“三件宝”。

□ 叶介甫

第一件宝：拂晓剧团

拂晓剧团是1938年初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山西临汾到河南竹沟后组建的。1938年4月底，竹沟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将要结业，而五一劳动节也快要来了。为了在劳动节纪念大会上能给竹沟群众和教导大队增加节日气氛，彭雪枫便责成由延安来此工作的著名木刻家刘岷和教导大队俱乐部主任路丁，从教导大队第一期学员中挑选几个擅长文艺的学员，组织一个剧团，演出几个节目。刘岷和路丁受命后，就从教导队中选拔了黄明善、王石青等15人，经过几昼夜排练，终于在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演出了《烽火》《黄浦月》《九一八以来》等几个节目。尽管当时的道具是临时凑合，幕布是用他们15个人的被单缝染，表演技巧也并不高，然而却博得了许多观众好评。尤其是彭雪枫，他坐在战士们当中从头看到尾，演出结束后还到后台来说了许多鼓励

的话。事隔两天，经彭雪枫批准，并由他命名的“拂晓剧团”在“五四”那天诞生了。

拂晓剧团正式成立后，彭雪枫及时提出要求：“要编一些配合当前抗日斗争的小话剧和活报剧，向群众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揭露汉奸和伪军罪行，打击日寇气焰。这样，既活跃了部队文化生活，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根据彭雪枫的要求，拂晓剧团随军到达鹿邑双楼，由宣传科长王子光亲自编导，第一次演出了活报剧《打鬼子》。该剧演的是两个狂妄的日本兵残酷杀害某村镇居民，群众恨之入骨，报信给我游击队，结果游击队将其抓获，并消灭了一个日军小队的事迹。

演出结束后，彭雪枫对扮演日军小队长的王挺说：“演得不错嘛！就是你们唱的那支日文歌，我和战士们都听不懂。”

1939年11月初，徐海东随刘少奇由竹沟到华中路过新兴集，彭雪枫命拂晓剧团组织一个晚会，以示热烈欢

迎。拂晓剧团接受任务后，大家争分夺秒，只用了一天时间，就集体创作排练出京剧《徐海东粉碎日寇“扫荡”》，第二天就在欢迎晚会上演出。

帷幕拉开，扮演徐海东的演员在一阵“急急风”的锣鼓声中上场，只见他战袍一撩，战刀一舞，亮相自报家门道：“我乃徐海东是也，湖北人士，窑工出身……”此时，正坐在台下观众席上陪同徐海东看戏的彭雪枫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附耳对徐海东说：“昨天我才交代他们搞一个晚会欢迎你，不想今天他们就现编现演了这出京戏，而且是就地取材，连你是湖北人、窑工出身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写进了戏里。”

徐海东听后也不禁连声大笑叫好，感叹道：“好好好，雪枫同志这‘爹家班’真是名不虚传哩！”

第二件宝：《拂晓报》

彭雪枫以儒将著称。在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他和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彭雪枫曾风趣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我要当个新闻记者。”

1938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彭雪枫在支队东征干部动员大会上宣布支队随军报社成立。第二天上午召开第一次社务会议，彭雪枫以党报委员会主任身份主持了会议。在讨论报纸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战斗”，有人主张叫“曙光”。彭雪枫说：5月间我们办了个“拂晓剧团”，“拂晓”代表了光明就要来临的意思，就叫“拂晓”吧！于是，报纸名称就被定为《拂晓报》。之后，彭雪枫欣然挥毫为《拂晓报》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题为《拂晓报——我们的良友》的创刊词。在说明报纸为什么定名为“拂晓”时，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

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要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

《拂晓报》9月29日正式创刊，第二天即随军出征。30日清晨，当一份草纸三版、油渍斑斑的《拂晓报》创刊号出现在整装待发的指战员们面前时，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此后，《拂晓报》就沿着支队东去征途，横越平汉，东渡黄水，征战在“涡河岸上”和“淮水两岸”。1939年12月5日《拂晓报》一百号纪念，毛泽东发来贺信，并亲笔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943年12月2日，《拂晓报》出版500期。当天，在师政治部举行出版500期座谈会。彭雪枫参加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贺〈拂晓报〉五百号——五年来之〈拂晓报〉的检讨》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其“万感交集，欣慰莫名”的激动心情，回顾了《拂晓报》自随军进入敌后，“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终于坚持了五年零两个月的长期过程而不懈”所取得的奇迹，发出了其中“包含着无限心血”的感慨！据四师老报人回忆，在彭雪枫所珍藏的那套《拂晓报》合订本的封面上，有彭雪枫亲题的“心血的结晶”五个大字。这是彭雪枫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拂晓”报人所作贡献的精确概括。

第三件宝：骑兵团

1941年8月1日，第四师在淮宝县（今洪泽县）岔河镇召开了师骑兵团成立大会，这是新四军唯一的骑兵团。该团的创建，是在仁和集会议上根据彭雪枫建议和反顽斗争经验教训而作出的决定，把师部骑兵团、特务团骑



兵连和第十旅、第十一旅骑兵团、排集合起来，抽调各部队中机灵、勇敢的战士、通讯员甚至班、排干部充实到骑兵团。当时，全团仅有指战员250余名，所辖只有3个连队。

骑兵团成立后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准备驰骋战场，杀敌立功。8月25日和9月29日，骑兵团于淮泗老陈圩子两次与土顽进行战斗，虽歼其一部，但亦暴露出训练不够、作战动作与协同不力的弱点，装具也不适作战需要。由此，彭雪枫感到骑兵团还要下功夫来加快建设。他与师领导研究决定：首先，调熟悉骑兵的周纯麟任副团长（后接任团长）。周纯麟曾于1936年在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受损后到达新疆，在喀什当过骑兵连长，学习过骑兵战术、技术及管理教育等。其次，拨淮北市3万元，解决马匹缺乏、马具不全、武器不足问题。再次，要周纯麟尽快拟订一个训练计划，开展骑兵团各项基本建设。

骑兵团经过整训，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以崭新姿态投入了新的战斗。1942年5月下旬，骑兵团第一、第三大队在泗县和泗阳县以北，痛歼从屏山、黑塔等据点出来抢粮的日伪军300余人，保卫了群众的夏收。此时正在

师部开政工会的彭雪枫闻讯极为兴奋，他下令将俘虏押送到管镇师部，向政工会议献礼。参加政工会的全体干部看到骑兵团的胜利战果，纷纷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11月，驻徐州日军十七师团和驻蚌埠日军独立十三旅团，在伪军配合下，向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师部对骑兵团下达命令：敌进我进，插到敌人后方和心脏地带去打击日军。

敌“扫荡”第3天，骑兵团打响了反“扫荡”第一仗。在日伪军驻守的泗县和青阳（今洪洪）之间的嚴箕窑，骑兵团三大队从敌侧后猛袭日军，击毙日军小队队长和翻译官等多人，俘获一部。青年骑兵丁翠红，一人就活捉了5个伪军。彭雪枫师长获悉骑兵袭敌的战报后，立即挥毫通报各部，命令再接再厉主动袭击敌人。

由于骑兵团不断获得作战胜利，威名远扬。人们唱道：“彭师长有三件宝，拂晓剧团、骑兵团，还有一张《拂晓报》！”

党史人物

远学谷文昌近学廖俊波

□ 李烈满



谷文昌



廖俊波

护林等宏大的物质形态构筑的，而且是由永恒的谷文昌精神铸就的，正所谓“生命有涯而精神不死”。

实际上，长期以来谷文昌精神一直在引领人们前进，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在党内开展的各种学习党的先进模范活动都强调要学习谷文昌精神，以谷文昌为镜，向谷文昌对标。时任政和县委书记的廖俊波就是这样做的。他把焦裕禄、谷文昌两位前辈视为镜子 and 榜样，他发现了自己的短处：“同样作为县委书记，对照焦裕禄、谷文昌精神深学细照笃行，不论是党性原则还是奉献精神，不论是求实作风还是为民情怀，都有不小的差距。”怎么办？他认为，唯有动起来、干起来，以行动告慰先辈，赢得未来。由此可见，廖俊波也是在焦裕禄和谷文昌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好干部。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对于谷文昌的学习，不是学多了、学够了，而是学有不足、行未到位。比如，有的党员干部对谷文昌精神还不甚了解，有的年轻干部甚至还不知道谷文昌是何许人，有的虽然知道一些，但是没有以知促行，还没有真正形成向谷文昌学习的自觉性。时代需要更多谷文昌式的好干部，必须持续推进学习谷文昌活动。

之所以要“近学廖俊波”，是因为廖俊波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楷模。廖俊波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优秀品质，是用生命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的好干部。他无愧于“全

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是“全国党员干部的一面旗帜”，是“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事业发展需要廖俊波式的好干部，人民期盼更多廖俊波式的好干部，必须深入推进学习廖俊波活动。

虽然廖俊波和谷文昌事迹发生在不同时期，他们的事迹有所不同、他们的精神也有各自时代的烙印，但是，尽管时移势易，廖俊波和谷文昌都具有一样的“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人格、品格和风格正是当今党员干部必须强化的核心素养。坚持“远学谷文昌，近学廖俊波”，就要在学习廖俊波中，感受谷文昌精神的永恒价值；在学习谷文昌中，深化对廖俊波精神的时代价值的认识，力求深刻领会他们的精神实质。在“两学一做”中见贤思齐、以知促行，努力成为谷文昌、廖俊波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远学谷文昌，近学廖俊波”，既是对福建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向全国党员干部发出的鲜明号召。这一“远与近”之说的哲理告诉我们，既不要忘了对于过去“远的”先进典型的学习，也不要忽视对于当代“近的”先进典型的学习。就全国而言，不仅要“远学谷文昌，近学廖俊波”，还要远学焦裕禄、雷锋、王进喜、孔繁森等好榜样，近学杨善洲、王启民、沈浩、王大年等当代楷模。让时代英雄精神得到传承，让当代英雄榜样得到效仿，在全社会和全党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围。

党建时评

六届六中全会：从理论自觉到道路自信

□ 刘 靓

经历了自1927年之后10年艰难革命路程的磨砺与考验，特别是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的熔炼与淬火，在抗战烽火燃遍大江南北、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中央全会，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召开此次全会的高度重视与充分期待。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而“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道路决定命运。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根本在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和历史使命。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在艰难和曲折中缓慢地推进前行。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早已走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实践之路，但是由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等重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思想到理论仍不成熟、并不统一。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问题的重大争论和原则分歧，毛泽东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即投入到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积极思考之中。而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孜孜与探

索，无疑为六届六中全会作了充分而坚实的思想酝酿和理论准备。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8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这四篇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全面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已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与气象。从1930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到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充满自信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任务和发展道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全会还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把握，已经克服并超越了狭隘的经验性认识，成熟并升华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说，自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始终沿着更加自觉、趋向成熟的方向发展和前进，这是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事业最为重大的

历史性贡献。此外，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概念表述和科学命题，是对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成为党领导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着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解决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突出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其中，“四个服从”的首次提出、政治规矩与纪律的重申和强调等等，不仅在当时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对时至今日党的建设依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国共产党，彰显出坚定的理论自觉，充满自信地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近8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擎理想与信仰，坚定的脚步不断拓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崭新境界。实践证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通向真理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

史海拾贝